# 一九八五年清代漠西蒙古历史研究综述

马 大 正

清代蒙古族可分为漠北、漠南、漠西三大部分，漠西蒙古亦称厄鲁特蒙古或卫拉特蒙古。漠西蒙古的历史活动在清代，特别是在清代前期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为治清史、蒙古史、早期中俄关系史的学者所关注，近些年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截止本文写作之时，一九八五年度已发表了有关本研究领域的著作四种，资料三种，论文三十篇，译文八篇。现作综述如下。

## 一、

继一九八四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厄鲁特蒙古史论集》和《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三书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准噶尔史略》，此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员撰写，全书二十五万字，分六章，重点叙述清前期厄鲁特蒙古的历史发展进程，并追述了元明时期厄鲁特蒙古先世的活动、以及厄鲁特蒙古独特的文化艺术与社会习俗。这是一本迄今为止国内史学界研究厄鲁特蒙古史的较为系统、详实的学术专著。需要指出，由于此书成稿于八十年代初，今天读来书中某些论述的中肯和史实的精当上，已有待润饰和补正。

作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一九九五年出版了《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和《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还有王辅仁、陈庆英编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十三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从蒙古史和蒙藏关系史角度，阐述了厄鲁特蒙古在清代前期的历史活动。

在综合性著述方面，有《新疆历史研究》一九八五年二期选刊的关于厄鲁特蒙古的辞条，这些是在编撰中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的一部分，包括了厄鲁特蒙古部族、历史人物、典籍、风习等各方面内容共七十七条，释文反映了当前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

## 二、

专题研究论文，大体可从下述五个方面进行综述。

（一）厄鲁特蒙古先世史研究

白翠琴《百刺境域变迁考述》（《蒙古史研究》第一辑）认为，明前期百刺活跃在蒙古高原，十五至十七世纪初，百刺境域发生了变迁，这种变迁大体上可分三个时期：从猛可帖木儿至也先，为向东向西大发展时期；从阿尔帖木儿、克舍、阿沙太师至十六世纪前期，百刺向西迁徙，但仍占有和林以西漠北地区；从十六世纪中至十七世纪初，百刺受俺答汗和喀尔喀诸部的攻袭，继续西迁，终于确立了以天山北道为中心雄视西北的布局。在百刺政治史研究方面，同一作者在《百刺王猛可帖木儿杂考》（《民族研究》6期）一文中通过对明初百刺首领猛可帖本儿史事的钩沉考究，叙述百刺勃兴期的复杂政局；薄音湖《评十五世纪也先对蒙古的统一及其与明朝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期）指出，也先对蒙古的统一是建立者的热忱，他自知无拨乱雄才，又骑虎难下，只好维舟蕞尔小岛，醉生梦死，歌舞达旦，自

的密切往来，典型地反映了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

（二）社会经济史研究

厄鲁特蒙古的社会经济是研究中的薄弱一环。蔡家艺连续发表了《准噶尔的畜牧业》（《民族研究》1期）和《准噶尔的农业》（《蒙古史研究》第一辑）。作者依据丰富的史料，对自己的命题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综合研究，指出：“准噶尔是一个游牧民族，畜牲业是准噶尔的社会经济基础”，“准噶尔人的畜牧业，主要是牧养马、牛、羊、骆驼四种牧畜”，在畜牧方式上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在夏秋二季“存在以‘和屯’为单位的集体放牧习惯”，二是“生产中较多使用着战俘奴隶”，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仍相当普遍。因此，一旦准噶尔贵族统治势力衰微，奴隶们群起反抗不可避免成为准噶尔政权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准噶尔农业，作者认为，准噶尔人习农业，识耕稼。巴图尔诨台吉对准噶尔农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但他不是准噶尔农业的“首倡者”，他统治下的准噶尔也不是农业最兴盛时期，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才是农业大发展时期。广泛使用“塔兰奇人”从事事农业，这是准噶尔农业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塔兰奇人”的农业不能代表整个准噶尔农业，从事农业的还有准噶尔人。并进一步指出：“游牧民族并非完全拒绝农业，反对发展农业˜畜牧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也不是绝对互相排斥，恰恰相反，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有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作用，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时，准噶尔社会经济之所以有较大发展，与农业生产的进步恐怕不无关系”。上述二文是作者的“准噶尔社会经济初探”系列论文之一和之二，我们期望作者早日完成这一有价值的研究系列。

（三）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研究

首先，对土尔扈特西迁和东返历史的研究。郭蕴华《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西域史论丛》第一辑，较全面地阐述了土尔扈特蒙古自西迁至东迫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概貌。关于十七世纪前半叶土尔扈特蒙古西迁的原因，罗丽达《土尔扈特为什么西迁》（《清史研究通讯》期）和蔡家艺《卫拉特蒙古史事杂考》（《历史档案》4期）对土尔扈特因受准噶尔巴图尔诨台吉排挤而西迁的记载，均持异疑。罗文认为：一六二五年厄鲁特部大内江“是土尔扈特西迁的直接和根本原因，而西迁是土尔扈特首领出于对这场自相残杀的内江事件的强烈不满所采取的抗议活动”；蔡文进一步指出：“牧地紧张，以及由于纷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是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故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并首次引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中渥巴锡归国后对福隆安的讲话，以资佐证。关于土尔扈特蒙古东返首义的时间，中外史载很不一致，马大正《土尔扈特东迫始于何时》（《新疆社会科学》1期)对比中外记载，细致考究，认为“一七七一年一月五日(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应是土尔扈特蒙古首义的准确日期”。马大正《新疆和硕特蒙古扎萨克的考述》(《蒙古史研究》第一辑)通过对新发现的二颗扎萨克印的研究，追述了参加东迫斗争的和硕特部落的业绩，以及回国后游牧于博斯腾湖畔的政绩。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厄鲁特蒙古历史研究，至今常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巴赫《公元一七五七年以后新疆蒙古族的分布与变迁》(《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3期)概述了迄止清末居住新疆地区的土尔扈特、厄鲁特、察哈尔诸部的发展，文章虽尚待充实，但应视为迈出可喜一步。

其次，卫拉特联盟是厄鲁特蒙古历史上重要事件。金峰《从〈和鄂尔拉克史〉看四卫拉特联盟》（《内蒙古社会科学》3期）通过对托忒文文献《和鄂尔拉克史》的研究，认为这本文献是研究“卫拉特联盟的成员及联盟形成的年代，内外方针、政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史料”，如此估价，也许过高，但其资料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论早期四卫拉特联盟》（《蒙

古史研究》第一辑是巴岱、金峰、额尔德尼用蒙文撰写的，据该文的汉文提要介绍，作者认为："四卫拉特联盟经历了早期（1437—1502）、中期（1502—1637）和晚期（163 —1758）三个阶段"。厄鲁特蒙古史研究的蒙文论述远不止这一篇，尚待精通蒙文的学者向学界介绍。

第三，十七世纪前半期和硕特蒙进据青藏是厄鲁特蒙古历史上又一重大事件，安应民《浅析和硕特蒙古进据青藏地区的原因》（《兰州大学学报》1期）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指出："卫拉特蒙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牧畜数量的增长与牧地之争是南迁的主要原因。而与青藏地区的宗教关系则是确定进据青藏地区的决定因素"。韩官却加《藏传佛教教派斗争与和硕特蒙古南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3期）着重从教派斗争的角度分析了南迁的原因，认为"此次事件不仅有它本身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更重要的是和当时西藏佛教格鲁派为剪除敌对势力，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采取的政治邀请是密切相关的"。蒲文成《试论雍正"癸卯之乱"的历史渊源》（《西藏研究》1期）认为顾实汗入藏的成功是由于得到西藏格鲁教派和清政府的支持，而半世纪后的罗卜藏丹津"欲复先祖霸业，却看不出变化了的历史形势，其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

第四，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许曾重《论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上）》（《清史研究通讯》1期）从清前期的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世界大国格局最终确立，这样的大前题出发，对噶尔丹作了如下评述，"以噶尔丹为代表的准噶尔统治集团准备统一蒙古，并扩大他势力范围的行动，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问题在于噶尔丹这样起步时，清朝已经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权，执行基本符合各族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等政策，开始取得成效。可是他（噶尔丹）却无视这种形势，执意追求既定目标，为此不惜勾结俄国侵略者。准噶尔部队侵入喀尔喀，不仅破坏了当地军民正在进行的抗俄战争，甚至还牵制了清朝与俄国的谈判。准噶尔统治集团在其所控制的地方，如'回部'，推行残酷的掠夺政策；袭击喀尔喀时造成当地广大牧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这一切都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蔡志纯《鄂齐尔图车臣汗卒年与殂地小议》（《内蒙古师大学报》1期）认为十七世纪和硕特部著名首领鄂齐尔图车臣汗是康熙十六年卒于西套，时正为噶尔丹所败。宋嗣喜《〈俄国政府给温科夫斯基的外交指令〉释析》（《新疆大学学报》4期）可视之为是对作者《策妄阿拉布坦与沙俄》（《民族研究》84年6月）一文的补充。前文已提及之蔡家艺《卫拉特蒙古史事杂考》还利用档案对噶尔丹妻子阿努达喇的出身，萨拉尔内附人产数，以及喇嘛达尔扎死事件作了有价值的考释。张羽新《车臣默尔根哈屯与承德安远庙》（《人物》4期）和郭蕴华《车臣·默尔根哈屯——聪明智慧的王妃》（新疆历史人物》第二集）两文对十九世纪中叶准噶尔达什达瓦部著名女首领为反对准噶尔部贵族分裂割据的斗争事绩作了概述。

（四）民族文字文献研究方面。

近几年来，新疆大学历史系诺布尔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成崇德分别对蒙文和托忒文本的《咱雅班第达传》进行了汉译和研究，诺尔布、冯锡时《〈咱雅班第达传〉的若干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期）和马汝行、成崇德《一部重要的厄鲁特蒙古历史文献——〈咱雅班第达传〉》（《新疆社会科学》1期）即是他们各自的研究成果，分别论述了成书经过版本情况，以及该书在研究厄鲁特蒙古史中的重要史料价值，使研究者能更好认识和利用这本文献。

（五）对居住于青海、甘肃的厄鲁特蒙古的研究

首先要提到是《海西蒙古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概况》和《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概况》，以及《青海省藏族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均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前两种属"中国少数

民族自治区地方概况丛书”，后一种则属“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这三本书对于我们了解居住在青海省蒙古族的历史、社会、习俗具有参考价值。却拉布吉、乌兰格日勒《肃北蒙古族婚礼仪式》（《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期）对居住在甘肃酒泉地区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硕特蒙古的习俗作了论述。

## 三、

在民族文字资料翻译以及国外资料和研究成果的介绍方面，也有新的进展。

（一）民族文字资料翻译方面。

民族文字资料中蕴藏有丰富的厄鲁特蒙古史的珍贵资料，但能直接利用民族文字的研究者，今天还是少数。因此有选择地汉译民族文字资料，是推动厄鲁特蒙古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一九八五年刊印的汉译民族文字资料，涉及藏、满、蒙三种文字。

多喀夏仲才仁旺杰《噶伦传》是成书于一七六三年的藏文史籍，所记多是著者亲历，我们从中不仅可以了解十八世纪前半期藏族社会的重大政治事件，还可以看到有关清朝军队护送准噶尔人入藏熬茶朝佛的记述，可以弥补汉文史料缺漏。《噶伦传》译注》（《藏文史料译文集》）是李凤珍译注的该书汉译稿。《年羹尧满文奏折摘译》（《藏文史料译文集》是汪玉明摘译自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年羹尧奏折》专辑中十七件满文奏折，为我们提供了雍正初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叛清事件的第一手资料。达磨三谟陀罗著、乌力吉图译《内洛陀音二世传》（《蒙古史研究》第一辑）对于研究十七世纪下半叶厄鲁特蒙古历史是一份有用的资料。

（二）国外资料与研究成果介绍方面。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德斯得利，一七一六——一七二一年在西藏传教期间，亲历准噶尔贵族进扰西藏，他在《西藏纪事》一书中以目击者身份记述了这一事件的始末，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李坚尚将此译出，题为《准噶尔贵族侵扰西藏目击记》（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一九六七年苏联出版了《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这是一本研究土尔扈特史很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李佩娟译该书绪论（《蒙古学资料与情报》3—4期）和蔡曼华译《阿玉奇统治时期的卡尔梅汗国》（《西北史地》1期）分别是这本专著绪论和第四章的摘译。羽田明是日本老一代学者，他的《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准噶尔史，厄鲁特的起源》（罗贤佑译，《蒙古学资料与情报》3—4期）和《关于大黄原产地为色楞格说》（陈世良译，《中亚研究资料》85年增刊，《中亚民族历史译丛（一）》）译文的发表，于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教授若松宽《十七世纪中叶的卡尔梅克族与东突厥斯坦》（日文刊于《蒙古史研究》第一辑，汉译文刊于《蒙古学资料与情报》3—4期）在利用新资料基础上，着重研究了僧格统格治前后准噶尔与南疆诸汗国的关系，这是尚待学者大力探索的研究领域，若松宽《准噶尔王国的形成过程》（贵日吉根译）和宫胁淳子《噶尔丹以前的卫拉特——若松说再批判》（陈世良译，两文均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3—4期）两文的译介，使我们对日本学者关于准噶尔王国形成问题的研究近况有所了解。

综上所述，一九八五年的厄鲁特蒙古史研究除《准噶尔史略》的出版为人们提供了一本较为系统的厄鲁特史专著，以及在社会经济史研究上有所进展外，从研究全局看，诸如社会制度史、十九世纪以降厄鲁特蒙古史等方面的研究，力作仍不多具，甚至还是空白；在民族文字资料的译介上也缺乏一个长远的规划，在校勘、考释方面也尚待艰苦努力。